

第二章 进口市场

第一节 解放前进口市场

一、开埠初期

咸丰十年(1860)天津开埠至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在全国的对外贸易中,英国具有垄断地位。天津对英国的直接贸易比重不大,对香港的贸易则占了绝大比重。从香港进口的货物占进口总值的半数左右。光绪十九年(1893),由于直接进口贸易的开展,从香港进口的货物比重下降。印度鸦片和棉织品在输入的进口货物中占相当地位,天津口岸很少与印度有直接贸易。印度的商品一般是经过上海和香港转销到天津。英国在这一时期是直接或通过其势力范围垄断了天津的对外贸易。

天津的进口贸易中,日本已逐渐增长。同治十二年(1873),日本直接输入天津的进口货物占天津直接进口贸易总值的 19.62%,至光绪十八年(1892)已上升到 23.32%

欧洲国家,占天津进口值的比重很小,同治十二年(1873)仅占 1.53%,光绪十四年(1888)上升到 7.43%,光绪十九年(1893)又下降到 5.14%,另有一部分货物是从上海及香港转运。

1894—1914 年的进口贸易,仍然有部分通过上海等口岸转口,但是直接进口的比重已逐渐加大。日本对天津的直接输入已升为第一位。英国退居第二位。香港的输入虽然比重很大,有时超过日本,但经过香港的进口是转口性质的。如果把香港与英国合并起来看,则英国在天津的进口中仍占绝对地位。进口贸易中的显著变化,是欧洲国家及美国所占的比重上升。在欧洲国家中,德国的商品在天津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抗日战争前夕

1914—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忙于战争。生产为战争服务,

民用品生产紧缩,交通工具主要投入军运,交战双方实行封锁禁运等政策,天津的进口商品输入国别地区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几乎垄断了天津的对外贸易,其次是美国。大战结束后,日、美、英三国在天津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美国输入的商品量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仍在日本之后。英国输入的比重虽在继续增长,竞争能力远远低于日本和美国。美国对天津输入增长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人民抵制英货、日货。1936年英国对天津的输入值为2851235金单位,仅占进口总值的8.88%左右;而美国对天津的输入值为3926565金单位,占进口总值的12.23%;德国的输入占进口总值的15.8%;日本的输入若把天津走私和冀东走私计算在内,占进口总值的37.34%,仍居第一位。

1914—1918年,日本对天津的输入始终占第一位;美国绝大多数年份居第二位,至本时期末退居第三位;香港大多数年份占第三位或第四位,至1918年却退居到第九位;英国大都占第四位,个别年份占第五位;德国自大战后在国际贸易中卷土重来,在对天津的进口贸易中发展很快,至1927年跃居第五位,1935年上升到第三位,至1936年竟战胜了竞争能力较强的美国跃居第二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严重地威胁了英、美在我国的利益,加深了日本与英国、美国之间的矛盾。英、美虽不甘心在中国取得的既得利益被日本夺取,但为了应付欧洲战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与日本寻求妥协。过去一直由英国控制的天津海关,逐渐由日本所操纵,最后到全面独占。

1938年天津进口的外国货物,日本占53.65%,至1942年占78.23%,1943年占67.44%。由于日本主宰了天津口岸的对外贸易,使欧美国家的贸易受到损失。天津市场的化学产品,过去均由欧洲供给,现在全部让位于日本,杂项肥料也尽为日货。至1939年,日本产品对天津口岸的输入占天津进口总额的46.81%。1942年,从日本及其属地的进口上升到88.63%。

三、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国民政府接管天津。国民党统治时期,天津口岸的对外贸易,基本被美国所控制,1946年在进口货物中,美国占69.36%(大批走私的进口货尚未统计在内),英国仅为1.6%。

美国控制天津口岸对外贸易,在进口方面,主要是以“援助”为名,通过多种渠道倾销其“剩余物资”,美国控制的“联合国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和其“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是美国推销剩余产品的重要机构。

第二节 解放后进口市场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在国民经济恢复期间,进口商品的输入,国别或地区的变化很大,1949年批证5141万美元,其中从苏联进口仅97万美元,占进口总值的1.88%;从朝鲜进口32万美元,仅占0.63%。至1951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缩小,对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迅速发展。从苏联等国家进口应当迅速增长,但由于都是易货贸易,结汇方式采用记帐方式,由中央外贸企业统一进行,因此天津的进口贸易额急剧下降。从资本主义国家的输入额,比重仍占主要地位,但贸易额是锐减的趋势。以往占比重较大的英国、法国、比利时、日本及新加坡输入值已不到1950年的十分之一,新加坡由于追随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于1951年终止对中国的贸易往来。

1949年,从香港进口值为3040美元,占天津进口值的59.40%,居第一位;从美国进口1193万美元,占23.21%,居第二位。从日本进口217万美元,占4.22%,居第三位;从比利时进口119万美元,占2.31%,居第四位;从苏联进口97万美元,占1.88%,居第五位;其次为印度、英国、瑞典、德国、新加坡等共28个国家或地区。

1950年从香港进口5555万美元,占天津口岸进口总额的22.54%,居第一位;从新加坡进口4668万美元,占18.94%,居第二位;从美国进口3475美元,占14.10%,居第三位;从日本进口额占11.25%,居第四位;从瑞典进口占10.72%,居第五位。其次为西德、比利时、苏联、法国、瑞士等。12月份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并强迫卸货,许多货物未能进口,其中有一部分货物已到海关却不再办理入关手续;另一部分货物则根本未予进口或因冻结不能进口。

在美国的压力下,对华贸易封锁逐步升级。日本于1950年8月实行特别输出许可证,禁止化学制品、金属矿物、汽车及其副产品输往苏联及中国。12月6日,日本政府颁布除日用杂货、农产品及海产品以外,一切生产品均禁止输往中国、朝鲜、香港、澳门。香港英国当局于1950年6月30日公布1950年输出统治法令,主要内容是:除持有及遵照香港政府工商处所发普通许可证或特别许可证外,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间接由香港输出货品。英国、加拿大等国先后宣布管制战略物资的输出。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的压力下,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决议。

1951年10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巴特尔法案》以及《互助防御实行管

制法》。规定任何接受“美援”的国家,如果把禁运物资出售给民主阵营国家(包括中国),美国即停止对其给予军事、经济、财政的“援助”。天津主要是从香港进口,全年进口值占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 72.22%。英国、法国、比利时、日本等对天津的输入值不及上年的十分之一。特别是新加坡,自上年的占天津口岸 18.94%,居第二位,降为零。当年的排位顺序是:香港占 53%,居第一位;印度占 8.84%,居第二位;西德占 2.18%,居第三位;锡兰占 1.88%,居第四位。

1952年6月,日本民间贸易团体和中国在北京签订了第一个中日贸易协议,双方规定进出口总额为6千万英镑。11月,又在北京签订了中日易货贸易合同,随着中日易货贸易合同的签订,日本政府也承认中日两国直接贸易。日本通产省于1952年12月26日发表第51次进出口公报时,第一次承认中日贸易进出口各47万美元。

经过几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天津的对外贸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进口贸易的输入国别和地区也相应变化。除了自苏联等东欧国家的进口贸易继续由各对外贸易总公司经营外,1953年以后配合发展国际经济关系和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宗进口交易也逐渐改由各进出口总公司集中谈判进行。因此,天津口岸的进口贸易额逐年下降,一直到1957年才有回升,但仍比1952年低。由于进口额很小,所以不能全部反映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发展情况,天津经营的进口商品多属工业产品。在进口贸易的国别地区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则占重要地位。

天津口岸的进口贸易中,香港的转口地位逐渐缩小,远洋的直接进口相应增加,1955年以前,英国在天津的进口贸易中,占第二位,仅次于香港。1956年以后,日本超过了英国而居第二位。西德、比利时、瑞士、印度、马来西亚等在天津的进口贸易中也日益恢复和发展起来。在中日双方有关人士的共同努力下,1953年和1955年陆续签订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从天津口岸的进口贸易中,日本对天津输入的商品值,1953年占2.56%,居第五位;1955年上升到24.56%,居第三位;1957年又上升到25.64%,跃居第一位。1957年日本岸信介内阁执政时,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使正在商签的第四次贸易协定不能执行,中日贸易中断。

英国的财政大臣巴特勒在1952年向美国提出的“要贸易,不要援助”的口号,自1953年开始逐渐变为现实。从天津的进口贸易中也能看出,1953年英国向天津输出的商品已占天津进口贸易额的第三位;1955年天津从英国进口429万美元,占天津进口额的26.42%,跃居第二位;1957年占20.51%,仍居第二

位。

1956年前三个季度大约每两天有一艘日本商船来到天津港。这些商船带来化学肥料、海带、人造丝、药品、染料、纺织品、五金工具和机械零件等,从中国运回大量的食盐、豆类、羊绒、矿产品、畜产品、土特产品等。

1957年,西方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要求解除或放宽禁运的呼声越来越高。英国在5月30日不顾美国反对宣布了单独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特殊限制。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破裂和国民经济调整的波动中,天津口岸的进口贸易的输入国别和地区也随之相应地变化。

1958年,进口商品输入的国别中,联邦德国占天津进口总额的39.77%,居第一位;英国占23.93%,居第二位;香港占8.86%,居第三位;日本占4.68%,由上年的第一位降至第四位,进口总额由上年的3240740美元下降到1570851万元,下降了41.53%。

1962年,进口输入国别中居第一位的是英国,比重却由上年的第二位上升到第一位;日本输入天津的进口商品占17.93%,为第二位;意大利占12.02%,居第三位;香港占10.48%,居第四位;比利时占6.31%,居第五位。

1964年,日本输入天津的进口贸易占41.39%,回升到第一位;英国占22.55%,居第二位;香港占8.47%居第三位;西德占6.56%,居第四位;瑞士占5.30%,居第五位。

1965年在天津的进口贸易值中,日本占41.43%,仍居第一位;英国占16.91%,仍居第二位;荷兰输入值为1291591美元,占10.48%,跃为第三位;西德为第四位;瑞士为第五位;香港的位次显著下降。在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贸易急剧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开始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在积极开展对亚非民族独立进行贸易的同时,进一步打开同西方贸易的渠道,努力扩大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

1966—1975年,这一阶段主要的输入国家和地区是日本、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典,它们的顺序虽有变动,但是日本总是占第一位。其变动情况是:1966年的顺序是日本第一、英国第二、联邦德国第三、法国第四、瑞典第五。除上述国家,与中国贸易的还有荷兰、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也门、阿尔及利亚、苏丹、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埃塞俄比亚、芬兰、巴基斯坦等共计25个国家和地区。1967年的顺序是日本第一、英国第二、联邦德国第三、意大利第四、法国第五。除上述国家,与中国贸易的还有荷兰、挪威、澳大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共计17

个国家和地区。1969年日本第一、联邦德国第二、英国第三、意大利第四、瑞典第五。除上述国家,与中国贸易的还有柬埔寨、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南斯拉夫等共计17个国家和地区。1973年日本第一、联邦德国第二、法国第三、香港第四、英国第五。除上述国家,与中国贸易的还有荷兰、加拿大、埃塞俄比亚、西班牙、黎巴嫩、索马里、阿根廷、美国等共计21个国家和地区。1975年日本仍占第一位,联邦德国居第二位,法国居第三位,意大利居第四位,英国居第五位。除上述国家,与中国贸易的还有南斯拉夫、民主也门、马来西亚、西班牙、秘鲁、美国等共计22个国家和地区。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了举世瞩目的上海公报,打破了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外交关系长期僵持的局面。在天津的进口贸易中,美国输入的贸易值是1973年为115901美元,1974年为1593629美元。1972年春季,中国首次邀请了42名美国商人参加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对增进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对加强中美人民的友谊,起到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天津进口商品输入国别和地区按照输入金额大小顺序排列,除日本长期占居第一位外,其他各国的变化极不稳定,1990年日本退居第二位,香港跃居第一位;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贸易对象的继续转移,几个资本主义大国来到中国市场;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在记帐贸易方式中断以后,也以自由贸易外汇的结算方式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其中除苏联以外,还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及利亚等。

1976年,天津进口商品输入国别和地区共计21个;1977年为19个;1978年又发展到22个;1985年34个;1990年35个。

美国与中国天津贸易发展很快,至1990年对中国商品的输入额已由1973年的12万美元,上升到2070万美元,在天津外贸排位顺序中居第三位,仅低于香港和日本。

1976年,前五名进口国别和地区是:日本、联邦德国、香港、瑞士、意大利。1977年顺序为:日本、联邦德国、香港、瑞士、荷兰。1978年的顺序为: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瑞士、意大利。1981年的顺序为:日本、香港、联邦德国、美国、加拿大。1985年的顺序为:日本、香港、联邦德国、美国、西班牙。1990年香港居第一位,顺序为:日本、美国、法国、联邦德国。